

图情简讯 (59)

主办：运城学院图书馆
编辑：图书馆参考咨询部
地址：中国山西运城

书香校园

书海导航

文献保障

☀ ☀ ☀ 馆内动态 ☀ ☀ ☀

◆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运城重要指示精神学术研讨会在我馆召开



在全国全党持续深入地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山西运城考察并作出重要指示，5月25日上午，运城学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运城重要指示精神系列学术研讨会（盐湖研究专题）在子夏楼图书馆3楼会议室隆重举行。党委书记薛耀文，党委副书记、校长

岳澎，校党委常委、副校长黄解宇、滕红梅、李新出席会议。研讨会邀请我校从事盐湖相关研究的19位专家学者作专题报告。各院系部主任、负责人和我校从事盐湖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共50余人参会。会议开幕式由科技产业处处长陈华荣主持。我馆陈越、张志杰和赵丽三位老师参加会议。

学术研讨会共设6个专题展开研讨交流，即盐湖微生物资源研究、盐湖植物资源研究、盐湖化学资源研究、盐文化研究、盐湖旅游资源研究和盐湖资源开发研究等专题。各位汇报人围绕盐湖保护和利用进行了热烈的交流。报告内容丰富详实，涉及微生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矿物学、生态学、文学、旅游学、管理学、音乐学、设计学和体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充分体现了学科交叉融合，展现出我校在盐湖相关研究方面长期积淀的厚重研究基础和强大研究实力。

(摘自校园网)

◆ 图书馆加强信息设备及管理工作

为配合我校智慧校园建设实施和推进图书馆高质量发展，保障馆内业务稳定、畅通运行，本学期自动化部对全馆计算机等信息设备进行了整理、维修和记录。通过系统化的问题排查和故障维修，解决了馆内职工日常使用计算机遇到的困难，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评价和认可。

随着计算机的长期使用，部分设备已出现老化现象，导致故障频发，其中网卡和显示器的故障率最高，电气元件失效，液晶变色、不显示等情况，经过更换或维修都得到了解决。此外，许多业务计算机操作系统受损、垃圾文件冗余，导致系统崩溃、运行不畅等故障，也得到及时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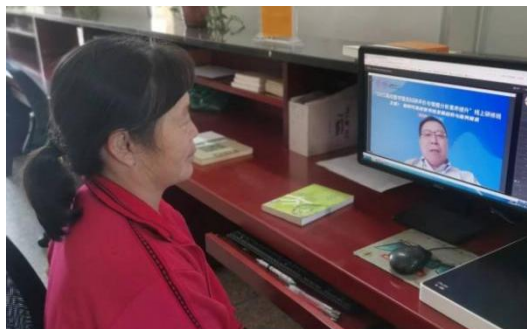


经过本次对老旧计算机故障排查与修复，自动化部重装了17台计算机系统，修复了12台计算

机故障，并回收了9台无人使用的计算机。同时，对馆内计算机的入网情况进行了登记记录，建立了网络IP地址台账，严格加强了管理。下一步，自动化部将继续为馆内的网络设施、信息设备及软件系统各类问题排忧解难，强化管理工作，以保证图书馆业务的正常运行，为读者和职工提供便捷、可靠的服务。

（撰稿：张峤）

◆ 馆员线上业务学习



为满足新时代高校科研评价与科研创新服务的需求，提升高校图书馆情报服务能力和图书馆员专业素养，中国知网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计划于2023年5月24日—26日，在全国高校图书馆范围内举办线上培训活动。

图书馆全体馆员积极报名参加本次培训活动。大家纷纷表示通过三天的学习了解了新时代高校图书馆发展趋势与服务需求、大数据在高校图书馆科研评价服务中的关键作用、图书馆情报服务在高校创新能力方面的促进作用。谢婷副馆长指出，本次线上培训加强了馆员队伍专业素养，提升了我馆服务能力。

（撰稿：陈越）

◆ 参考咨询部完成科研处捐书编目

本学期科技产业处捐赠给图书馆一批近年来我校教师出版的著作。这批图书的编目工作由参考咨询部完成。

该项编目工作，是我馆更换新一代管理系统之后的首次实战操作，参考咨询部的工作人员在编目过程中，积极与采编部同事和汇文管理软件的售后人员联系沟通，熟悉资源管理模块的编目、典藏等业务流程，5月19日完成捐赠图书的编目及打印馆藏清单工作。该批捐赠图书，共计181种，259册，全部典藏在河东文化文献数据中心。

这批编目图书是对我校教师个人教学资源的一个重新整合，扩充了我馆馆藏资源，丰富了图书馆校本库的内容，今后我馆将持续做好校本资源的开发建设，定期对校本库进行更新维护，不断充实我馆校本库，使之形成良性循环。



（撰稿：范晓丽）

◆ 图书馆展出2023届美术与艺术设计系毕业生部分作品



2023届美术与艺术设计系毕业生作品毕业创作展以“向未来”为主题，共计300余件（套），分别在画螺楼、艺术长廊、图书馆3个展区展出。

图书馆各岗位工作人员认真负责、积极配合，为本次毕业创作展的顺利进行增砖添瓦。本次展出作品以河东文化为创作源泉，从思想政治、乡村振兴、文化旅游、校园文化四个方面展现了新时代新风貌，主题鲜明，风格多样，涵盖油画、国画、水彩、版画、漆画以及各类文创产品、平面设计、UI设计、

主题鲜明，风格多样，涵盖油画、国画、水彩、版画、漆画以及各类文创产品、平面设计、UI设计、

环境设计等作品类型。学生们用独特的艺术视角展现了年轻一代的青春锐气与专业才华，既体现了美术与工艺设计系在立足河东文化、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方面所展开的探索与实践，同时也凝聚着指导教师的心血和同学们的辛勤付出。

（撰稿：陈信）

*** 图情前言 ***

业务学习（五）

◆ 新媒体阅读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服务模式构建

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和阅读紧密相关。历史上的每一次变革，都推动着阅读方式以及阅读形态的转变。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开始融合，读者阅读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校图书馆应结合实际情况，合理运用信息技术，构建新媒体阅读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服务模式。

1 新媒体阅读的概述

1.1 新媒体阅读的概念

新媒体阅读是以数字媒体、互联网等为载体，借助客户端等新媒介进行传播的一种阅读形式。与传统纸质媒体的阅读形式相比，新媒体阅读有独特的优势，其可以满足人们的多样化阅读需求。这促使了传统阅读方式的改革，使新媒体阅读成为当下人们阅读的一种主要形式。

1.2 新媒体阅读的优势

新媒体阅读有三大优势。第一，信息获取更加便捷。新媒体阅读不以纸质材料为媒介，而是借助一些电子设备，比如电脑、手机等传递图书资源信息。在图书馆，人们通过登录相应的 App 账号，就可以直接查询到需要的书籍。这就达到了只要具备阅读设备，就可以随时随地进行阅读的目的。总体而言，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不需要占据太多的空间，既环保又省钱，同时还方便携带。读者不需要再花费大量的时间往返图书馆。第二，新媒体阅读资源比较丰富，不仅包含了文字类的资料，还有视频资料。新媒体阅读融合了声音、图画等方式，为人们提供了较好的审美和视听体验。对年轻人而言，他们更喜欢这类新媒体阅读形式。第三，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交互性。纸质媒体在传播过程中通常都是单向的，但是新媒体和纸质媒体不同，其具有开放性，且每个读者都可以借助新媒体技术与馆员进行交流。读者之间也可以进行双向或多向的交流互动，也可以发表关于阅读的建议和观点。

1.3 新媒体阅读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服务模式存在的问题

1.3.1 高校图书馆缺乏对新媒体阅读服务的重视程度

新媒体技术在各行各业中被广泛应用，高校图书馆也不例外。国内的高校图书馆在新媒体阅读服务方面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只有部分重点高校在积极推进新媒体阅读的服务工作。还有一些高校在构建新媒体阅读服务模式时，没有学校本身的个性和特点，只是一味地模仿，并没有从平台、服务、内容等多个方面构建独具特色的新媒体阅读模式。还有少数高校图书馆虽然开通了微信、微博等新媒体账号，但是并没有与读者进行沟通、互动，而仅仅将其作为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

1.3.2 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资源建设不足

各个高校的新媒体阅读服务模式存在一定的差距，比如有些高校已经建立了数字化阅读平台，也完善了相应的检索功能。读者只需要登录平台进行检索，就可以搜索到自己需要的阅读信息。然而，有些高校虽设置了检索功能，但需要安装插件，过程非常烦琐。总体而言，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资源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发展。高校图书馆并未借助新媒体优势扩充阅读服务内容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高校图书馆改进服务模式提供了可能。高校图书馆可以利用新媒体技术制作网页，搭建阅

读平台,进行图书馆业务的宣传,满足读者借阅和咨询图书的需求。但是在实际调查中发现,部分高校只是利用论坛、微博等进行简单的阅读推广活动,还有极少数高校会借助移动终端进行阅读推广,但是整体来说为读者服务的内容是类似的,形式也都比较单一。这导致读者参与的兴趣并不高,无法调动读者阅读的兴趣,也没有充分发挥出高校图书馆的作用。

1.3.3 高校图书馆馆员缺乏阅读服务能力

高校图书馆需要服务的对象大多都是学生,其对新媒体技术的接受能力比较强。因此,需要打造一支具备服务理念、业务素质能力比较强的人才队伍,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出高校图书馆服务的作用。然而,大部分的高校为了节省资金,并没有在图书馆中配备比较专业的图书管理员,部分图书管理员只是具备图书相关的专业背景,并不了解图书馆转型的必要性以及紧迫性,无法利用新媒体开展阅读服务。

2 新媒体阅读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服务模式转变方向

2.1 图书馆馆藏资源的转变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比如服务模式、信息获取方式、图书馆馆藏资源等。高校图书馆需要借助新媒体的媒介载体、服务机制,立足于新媒体的发展,不断改革和创新传统图书馆服务模式。馆藏资源是高校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媒体环境下,图书馆馆藏资源应逐步向数字化转变,如搭建高校图书馆信息管理平台。这类平台既可以对图书进行高效化管理,又可以丰富馆藏资源,加快数字化图书馆的建设,满足高校读者的个性化需求。

2.2 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的转变

新媒体具有多样化、互动性等特点,这转变了传统高校图书馆的单向服务模式。在新媒体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可以借助数据库搜索、在线订阅等方式,为读者提供全面的信息服务。高校图书馆管理员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更加了解读者对书籍的需求,丰富现有的数字化资源。除此之外,借助微信、微博等平台,能够和读者进行互动交流,提升高校图书馆的服务质量。

2.3 图书馆信息获取方式的转变

移动终端的使用使得信息获取的渠道进一步拓宽,人们动一动手指就可以获取来自各个地区的信息。在高校图书馆中,管理员可以借助新媒体,向读者推送各种各样的图书信息;而读者通过图书馆 App 等渠道,就可以直接阅读这些信息。这改变了图书馆传统单一的阅读模式,信息获取方式逐渐多元化。

3 新媒体阅读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服务模式的构建策略

3.1 提升高校图书馆对新媒体阅读服务模式的重视程度

新媒体在高校图书馆中的应用,既符合时代发展的特征,又有利于高校图书馆的创新。然而部分高校图书馆对新媒体阅读服务模式的重视不够,导致新媒体阅读服务模式构建进程较为缓慢。因此,高校相关领导者应提高对新媒体阅读服务模式的重视程度,督促图书馆管理员积极学习新媒体技术,根据高校图书馆的现状创新阅读服务模式。此外,还要定期对高校图书管理员阅读服务模式进行评价,评价的主体包含高校图书馆的读者和学校的相关领导者。通过多方的评价,可以提升图书馆管理员创新服务的积极性,发挥出新媒体阅读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作用。

3.2 建立数字化的图书馆阅读服务平台

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高校应建立数字化图书馆阅读服务平台,读者通过检索功能就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书籍,实现线上阅读。在阅读服务平台上,还应该设置反馈板块,便于读者反馈系统的问题或书籍的问题。图书馆管理员利用大数据进行分析,整合常见的问题,及时对后期阅读服务进行优化。此外,还应设置读者沟通板块,在这一板块中,读者可以基于阅读的书籍进行沟通,同

时也达到了宣传书籍的目的。

3.3 开发新媒体阅读资源

开发新媒体阅读资源是构建高校图书馆服务模式的内容之一。新媒体阅读不仅是对传统纸质阅读的一种升级，同时也是对纸质阅读的一种发展。在高校，除了要将纸质阅读转变为数字化阅读之外，还要与其他高校开展合作，开发数字化的新媒体阅读资源。比如引进高校师生在科研过程中可能会用到的书籍和资料，并将其转变为具备视听功能的数字化资源。当然，也可以通过购买商业数据库的方式，进行特色文献资源建设。还可以定期搜集并整理数字化的资源，丰富馆藏资源。各个高校图书馆之间应积极合作，实现文献的传递和借阅。

3.4 开展新媒体阅读的推广活动

阅读推广是高校新媒体阅读服务的一项内容，高校图书馆管理员需要从读者阅读需求出发，开展关于图书馆新媒体阅读资源的讲座，这样可以提升读者的新媒体阅读素养，提高图书馆数字化馆藏资源的利用率。首先，图书馆可以借助社交媒体，进行新媒体阅读推广活动。在社交网络中，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因此图书馆可以借助各种网络平台，比如在QQ、抖音、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发布一些新的书籍，吸引更多的读者进行阅读和借阅，让读者更好地了解馆藏资源。其次，定期举办新媒体阅读活动。为了营造良好的高校阅读氛围，图书馆管理员可以借助新媒体平台举办线上图书分享会、演讲会，不仅能提高高校学生的素养，还能提升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效能，从而吸引更多的读者参与到书籍阅读中。

3.5 提供自助服务和空间服务

新媒体技术的诸多优势，为高校图书馆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可能。比如部分高校图书馆借助无线射频识别技术服务，实现了自助借书、还书以及证件管理。若读者在新媒体阅读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操作方面的问题，自助系统就会直接帮助其进行解答，这大大节省了图书馆的人力资源。在空间服务方面，新媒体赋予了图书馆双重功能，读者既可以去实体图书馆借阅书籍，又能在线上直接阅读书籍。在新媒体技术普及后，高校图书馆应尽可能拓展空间服务，增加馆内储藏的数字化资源，提高新媒体阅读服务质量。

开展个性化深层次的新媒体阅读服务当下，每天都有很多的信息充斥在人们的生活中。读者获取信息的途径也变得多样化，高校在建设图书馆新媒体阅读服务模式时，应该紧跟时代的潮流，利用多种手段，以满足读者对阅读方式和阅读信息的需求，继而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个性化服务。图书馆首先需要整合自身的数字资源，建立数据库，便于师生下载各种需要的学习资源；其次要利用新媒体技术的数据挖掘功能，了解师生对不同类型书籍的喜爱度，满足不同读者的个性化需求。

3.6 提升图书馆馆员的服务能力

无论是高校图书馆还是社会型图书馆，基本宗旨都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改革。而作为创新和改革的主体，图书馆管理员应具备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积极主动地进行创新。这首先需要高校加强对图书馆管理员的培训，定期开展与新媒体技术相关的讲座或活动，加深图书馆管理员对新媒体技术的了解，为新媒体阅读服务模式的构建提供更多可能。其次，鼓励高校图书馆管理员进行创新，对积极参与创新和提供合理建议的管理员，高校可以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最后，高校之间可以定期进行沟通与合作，如此既有利于构建新媒体阅读服务模式，又能够提高高校图书馆管理员自身的素质。

图书馆作为高校重要的一部分，应该借助新媒体的优势，不断创新传统的服务模式。如借助新媒体，丰富馆藏，构建具有互动性的信息服务模式，拓宽获取信息的渠道等。此外，还需要高校图书馆提高对新媒体阅读服务模式的重视程度，建立数字化的图书馆服务平台，利用新媒体进行阅读

推广活动等,真正发挥出新媒体在高校图书馆阅读服务模式中的创新作用,促进高校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

业务学习(六)

◆ 图书馆与社会记忆、文化记忆的关系

1 图书馆与社会记忆

人类社会文明成果信息的体外记忆载体主要是广义上的文献。人类文化创造活动的不间断性,必然致使文献数量的剧增(大体表现为指数式增长,文献计量学中的“普赖斯定律”证明了这一点)。文献数量的剧增,若不加以人为干预就必然导致整个文献系统的无序性,这种无序性又必然导致人们利用文献的不便性。由此必然产生集中收藏和序化文献的专门设施的需要,图书馆就是这种集中收藏和序化文献以便利用的专门设施之一。在一般意义上,个体记忆过程可分为存储、编码和提取三个环节。图书馆活动过程与个体记忆过程具有同构性,即图书馆活动大体上亦由文献的存储、文献的编码(分类、编目等整序过程)和文献的提取利用三个环节构成。所以,可将图书馆视为人类文明成果信息的体外记忆即社会记忆设施。由此而言,图书馆可以说是社会记忆需要的产物。

杜定友说:“好像人的脑子,本应记忆许多事情,但一切事情都要这脑子记忆是不可能的;而图书馆的功用,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记忆,实际上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一个人不能完全地记着一切,而图书馆可记忆并解答一切。”美国图书馆学家巴特勒(PierceButler)说:“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装置,图书馆则是将人类记忆的东西移植于现在人们的意识之中的一个社会装置。”德国学者卡尔斯泰特(PeterKarsted)说:“图书是客观精神的容器,图书馆是把客观精神传递给个人的场所;图书馆就是使文化的创造和继承成为可能的社会机关。”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JesseHaukShera)说:“图书馆正是社会的这样一种新生事物:当人类积累的知识大量增加以至于超过了人类大脑记忆的限度时,当口头流传无法将这些知识保留下来时,图书馆便应运而生了。”此引诸说,其实都在说图书馆是社会记忆设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现代图书馆学者中,从“社会记忆”角度论述图书馆学原理者并不多,虽然杜定友先生首先提出有“图书馆记忆说”,但未能专门展开论述。不过宓浩、刘迅、黄纯元三位学者合著的《图书馆学原理》一书之“图书馆的社会职能”一节中,却把“社会记忆”确认为图书馆的社会职能之一,并对文献的“体外记录”功能和图书馆的“社会记忆”功能作了较系统的阐述,如下言:从文字产生和记录于物质载体形成文献,是人类由自身体内贮存发展到知识的体外记录,从口耳相传进化到文献交流,是图书馆起源必要前提。由体外记录和文献交流发展的需要形成最初的文献收藏活动,是图书馆早期的存在方式和活动内容。社会文化遗产的保存和继承是依靠社会创造的文字记录,文字记录的保存是社会记忆的重要手段。图书馆作为保存人类文字记录的机构,它是社会记忆的体现者……这种社会记忆功能,能够长久保存和积累社会的知识,能够为再生和创造社会文明提供条件。

2 图书馆与文化记忆

社会记忆、文化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等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相互交叉,甚至有时相互重叠,所以有时可以相互交替使用。当然,社会记忆、文化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等作为不同的记忆类型,相互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仅就其中的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而言,社会记忆更多地强调记忆的主体——社会,而文化记忆更多地强调记忆的内容——文化。这是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的最显著区别之一。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都属于人类的体外记忆形式,都要借助体外载体进行保存、加工和提取活动,这是两者之间最显著的共同之处。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认为,研究人类的记忆可从三个维度进行:神经维度、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从神经维度考察的记忆即个体记忆,其载体为“个体大脑”,而从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考察的记忆即社会记忆和文化记

忆,其载体均为体外载体。无论是社会记忆还是文化记忆,文献是其重要载体形式之一,而图书馆则是其得以实现的重要社会设施之一。本文前面从社会记忆角度论述了图书馆之功用,下面将从文化记忆角度论述图书馆之功用。

人类借助体外物质载体记录、存储、加工和传播文化信息的过程,若用记忆论的术语说就是“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的过程。简单地说,文化记忆就是文化信息的“记”(存储)和“忆”(提取)的循环递进过程。文化记忆可视为是人类文化进化的内在机制,即人类是借助文化记忆实现文化进化的。人类是能够在生物进化基础上进行文化进化的动物。能够进行文化进化,是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区别。进行文化进化,需要借助体外载体,为此人类发明了诸多记载文化信息的体外载体,如甲骨、金石、泥板、简帛、纸张以及现代的电子载体等,同时发明了与之有关的文字、笔墨、造纸术、印刷术等。能够借助体外载体进行文化进化,说明人类是“善假于物”的动物。德国的扬·阿斯曼(Jan Assmann)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夫妇是较早系统研究文化记忆的著名学者。他们对文化记忆的释义是:社会交往出现了过度膨胀的局面,随之要求产生可以起中转作用的外部存储器。社会交往体系必须要产生出这样一个外部范畴:它可以使需要被传达的、文化意义上的信息和资料转移到其中。伴随这个过程产生的还有转移(编码)、存储和重新调出(再次寻回)的一些形式。要实现这些,就需要有一定的机构性框架及专业人员,通常还要有记录体系,如用来记事的绳结、丘林加及用来计数和运算的石头,直至最后文字出现。在膨胀了的社会交往局面和必要的中转存储器之间,记录系统发挥着作用,而文字就诞生于这样的记录系统之中。

这段话中的所谓“过度膨胀的局面”即“膨胀了的社会交往局面”,指的是知识和信息的剧增所造成的记忆困难之“可怕的情况”(zerdehnte Situation);所谓“外部存储器”或“外部范畴”,就是指文化信息的体外记载系统。这种体外记载系统实际上就是文化记忆的主要形式之一。从这段文字表述中可以看出,阿斯曼夫妇非常看重文字在建立体外记载系统中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只有在严格意义上的文字被发明之后,社会交往的外部范畴才可能成为自主、成体系的存在”,此话确然。文字其实就是人类的文化信息的体外记载需要的产物。阿斯曼夫妇研究人类的记忆现象,首先区分了交流记忆和文化记忆这两种记忆类型。交流记忆(Kommunikatives Gedächtnis)又可译为交往记忆、交际记忆,指个体之间通过身体和口耳相传途径进行信息传递活动所形成的记忆方式。身体活动是交流记忆的载体,所以交流记忆需要借助个体的身体活动,而文化记忆则既可以借助身体活动而进行,亦可脱离身体活动而进行。可见,交流记忆属于“借助身体的记忆”(embodied memory),而文化记忆则更多地表现为“借助物体的记忆”(embedded memory)。阿斯曼夫妇往往把“借助物体的记忆”称之为“借助象征性客体实现的记忆”,且将这种记忆类型称之为“存储性记忆”(Speicher Gedächtnis)。关于交流记忆与文化记忆的区别以及文化记忆得以实现的社会支撑条件,扬·阿斯曼认为:我们个体的记忆随着生命的终结而消失,交流记忆一般持续三代,即八十至一百年的时间范围,而借助象征性的客体实现的记忆则可以横跨上千年的时间范围,因为这种记忆的承载物是文字、符号、图画等。正因为这种记忆所经历的时间范围巨大,它才发展成为文化记忆……人在这个世界生存需要两种记忆:一个是短时段之内的交流记忆,另一个则是长时段之内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离不开支撑它的环境、机构以及相关的人员,诸如图书馆、博物馆、学校、剧院、音乐厅、乐团、教堂、犹太会堂、清真寺、教师、图书管理员、牧师、犹太拉比、伊斯兰教长。没有上述机构、媒介和专业人员,我们就无从谈起文化记忆。从上引扬·阿斯曼的一段话中,我们可以至少读出三方面的信息:①从记忆的时间长度而言,交流记忆为短时段记忆,文化记忆为长时段记忆;②文化记忆的物质载体有文字、符号、图画等;③文化记忆的实现需要相应的机构、媒介、人员等社会支撑条件。尤其在谈及文化记忆的社会支撑条件时,扬·阿斯曼点到了图书

馆、图书管理员，这就明确了文化记忆与图书馆紧密相关。法国学者利科（P. Ricoeur）认为，人类建立有多种多样的“记忆场所”，包括“三色旗、档案馆、图书馆、词典、博物馆，还有纪念仪式、节日、先贤祠或凯旋门、拉鲁斯词典和巴黎公社墙”。利科在这里也把图书馆视为“记忆场所”。

通过了解上述文化记忆理论，我们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人类自从发明文字以来，就已经开始了体外记载文化信息的历史；从实物遗存而言，文化记忆主要保存于历代流传下来的浩繁的文献之中；文献的集中存储，产生了图书馆，由此形成“存储性记忆”。这就是以“文字→文献→图书馆”之链铸就的人类文化源远流长的“存储性记忆”之链。也就是说，古代图书馆为中华文化发挥了“存储性记忆”的作用，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从根本上说，作为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的设施，图书馆的存在价值首先在于对人类文化信息的体外集中存储与传递功能，这一点通过文化记忆角度得到了解释和证明。而“敬惜字纸、珍藏文献”也成为古今图书馆人秉持和传承的职业价值观。

3 图书馆记忆的机制

通过对中西方早期文明中对文献的收集、阅读和图书馆活动的历史记忆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无论是中国历代皇家图书馆的建设及管理，还是西方早期图书馆的建立，最终都指向了共同的方向：

（1）东西方文明均重视文献的积累、制作和收集，广收天下书籍来充实馆藏；（2）均重视藏书目录体系的编制，这不仅体现为图书馆管理水平的进步，而且形成了相较于其他社会机构而独有的记忆机制，构成了图书馆的凝聚型社会结构；（3）均重视对文献的制作以及对经典文献的注疏，引导社会形成对经典的崇拜氛围；（4）中西方古代图书馆均不仅是文献保障机构，同时又是社会教育机构。

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结晶的存储和传播机构，是如何参与社会记忆的，即图书馆历史记忆的机制问题。考量图书馆的历史记忆机制问题，主要可从文献、图书馆与馆员三个要素入手。毫无疑问，文献的生成是图书馆这一社会机制产生的基础，没有文献就不会有文献整理、保存和利用的需要。这里所说的图书馆，主要指图书馆的建筑实体，即古代所谓的馆阁等贮存图书、传抄文献之所。图书馆集知识精英与文献于一体，是文化记忆得以有序保存和传播的记忆之场。馆员是文献整理活动的主体，在文化记忆传播过程中，职业的分工被视为文明进步的体现，在图书馆活动中，专职图书馆员的出现标志着图书馆作为一种文化机制走向成熟。蒋永福先生提出，客观知识、图书馆、人三者之间的关系空间，应该是图书馆的研究对象。他指出，客观知识是图书馆的逻辑起点，人是客观知识的动物，而图书馆是管理客观知识的社会机构，是人类追求知识生活方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此论在考察图书馆的记忆机制中已然适用。蒋教授所指的“人”不仅包括图书馆员，还包括读者。关注图书馆的历史记忆机制，当然不能绕过对图书馆读者的研究，本文不对其考察不是说读者在这一研究范畴内不重要，恰恰相反，读者的因素对图书馆记忆的建构作用非常大，但是本文的着眼点在于将图书馆记忆机制界定为以图书馆为中心的主动记忆要素，因此将“人”的因素限定为图书馆员。

3.1 文献：人类认识结晶的体外记忆载体

文献的生成是图书馆这一社会机制产生的基础，没有文献就不会有文献整理、保存和利用的需要。知识或信息是人们对事物进行长期的观察和实践而得到的认识结晶。这种认识结晶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人类正是凭借这种认识结晶才能走出蒙昧野蛮状态，进而成为文明人。而如何将知识或信息藏起来，使其代代相传而免于“重蹈覆辙”之苦（重新认识之苦）也成为了困扰。这一困扰的实质是如何将信息或知识藏之于人体之外，使其不与个体人的生命“同生共死”，从而使后人或他人能够“坐享其成”。用现代的话来说，是如何解决信息或知识的“体外传播”问题。能否解决这一困扰，成了人类能否从野蛮时代跨入文明时代的关键问题。

知识或信息作为人的认识的产物，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起初，人只能依靠自身的记忆机能将其存储于大脑之中，这一点其他动物也如此。大脑作为人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生命的死亡而死亡，其中所存的认识结晶亦随之消失。这就表明，体内所藏的认识结晶无法解决其跨时空传播的问题。这就迫使人类转而思考信息或知识的体外存储的可能性。经过长期探索和努力，人类利用能够制造工具的能力逐渐寻找或制造出了能够藏道于其上的各种物质载体，如从起初的甲骨、木方、石碑、青铜、泥版、羊皮到简帛、纸张，再到现代的各种胶质、电子介质等。期间还包括文字、记录工具、印刷术、装帧技术的发明与完善。这些藏道于其上的各类物质载体，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文献。而文献的生成是图书馆这一社会机制产生的基础，没有文献就不会有文献整理、保存和利用的需要。

对文献的体外藏道功能，中国古人有一句经典概括——文以载道。文以载道中的“文”，就是文字及其记录之产物，即我们今人所称的“文献”。体外藏道是为了实现体外传道；这种体外藏道和传道机制相当于体外记忆机制。我们知道，记忆由“记”和“忆”两个环节构成，记就是存储，忆（回忆）就是提取。体外藏道和传道也同样具有“记”和“忆”的机制：“记”就是藏道，具体表现为用记录工具（如文字和笔）把道记录于体外载体上的过程，也就是形成文献的过程；“忆”就是传道，具体表现为阅读文献的过程，即提取文献中的道（知识或信息）的过程，亦即读取意义的过程（读取即提取），这种读取意义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传道的过程。如果这种读取意义的过程是跨时空进行的过程——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异时异地交流，那么这种读取意义的过程是一种跨时空传道的过程。体外藏道和传道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为人类创造出了唯人类所独有的体外跨时空传道的机制。

3.2 图书馆：社会记忆的媒介

社会记忆，是针对生物记忆（生物遗传意义上的本能性记忆机能）和个体记忆而言的。社会记忆与生物记忆、个体记忆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记忆主体为社会，而非个体；二是记忆载体既有体内载体，也有体外载体，但其长期留存和传播主要靠体外载体；三是记忆主体的属性表现为群体性，而非个体性，因此社会记忆是一种共同记忆。社会记忆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集体记忆、历史记忆、民族记忆、文化记忆等。而文献作为体外记忆的载体，大量聚集后便形成了图书馆这一文化记忆机构。这里所说的图书馆，主要指图书馆的建筑实体，即古代所谓的馆阁等贮存图书、传抄文献之所，这里集知识精英与文献于一体，是文化记忆得以有序保存和传播的记忆之场。

在古代西方，文化中心是随着具有影响力的图书馆的建设和存续而转移的，文化记忆的传播始终围绕图书馆的活动展开。建于公元前 290 年左右的亚历山大博学园与图书馆聚集了一大批当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者，甚至亚历山大图书馆早期文献的积累也得益于亚里士多德私人藏书的倾囊捐赠。托勒密时代的历代国王都努力为图书馆收集图书。在古代中国，无论是官府、社会组织还是民众，其对聚书的热情更加高涨。这从古代中国皇家图书馆、寺院图书馆、书院图书馆、私家藏书楼四位一体的图书馆体系的建设和管理进程中即可见一斑。以古代中国历代的皇家图书馆为例，其藏书主要通过自产、征集、抄写等途径形成，仅仅是自产的文献数量就非常庞大，据不完全统计，南宋嘉定以前所修的当代史料书籍总数就达到了 10576 卷；而清代更甚，总数达到了 209 部 22833 卷。在接收文献方面，隋朝开国之初便接和平收了来自前朝的一万五千元卷藏书。历代征集文献的数量更多，清朝乾隆年间所修《四库全书》，其底本图书除了从《永乐大典》辑出一些外，其余大多数来自民间的征集，共采得书 13781 种。在抄写方面，历代朝廷均组织人手抄写书籍以补充馆藏，抄写也是印刷术普遍用于书籍出版之前文献复制的主要方法。从抄工的数量可以侧面考量抄书的规模，如明代修《永乐大典》动用抄工人数多达 26669 人，清代修《四库全书》，共抄写正副本八份

(每部近十亿字)，动用缮写、装订人员 3800 人。

我们可以看到，图书馆的神奇魔力在于“文献之聚”。图书馆对于文献的独特社会记忆表现为人类对聚书的痴迷。人类始终将聚书视为积极、正向的力量，从而形成了一种“敬惜纸字”的社会价值观，进而推崇到整个社会，如社会对儒商的敬仰与肯定，而散书则被认为是家道中落的标志，是一种“败家”行为。

3.3 馆员：图书馆记忆的专职传承者

在文化传播过程中，读者的因素对图书馆记忆的建构作用也非常大，但本文的着眼点在于将图书馆记忆机制界定为以图书馆为中心的主动记忆要素，因此将“人”的因素限定为图书馆员。为了履行“记忆—责任”，文化记忆始终拥有专职承载者负责其传承。图书馆的专职馆员，便掌握着关于文化记忆的关键。在无文字的社会中，对记忆承载者的最高要求便是对记忆内容进行一字不差的传承。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记忆完全被当做“数据存储器”，是文字性的先行形式。是否具有专职的记忆承载者是文化记忆区别于交往记忆根本性不同的一个关键因素。

随着传承下来的文献被奉为经典，专门负责对其进行解释的机构和知识精英应运而生。政治机构具有不容置疑的规范性和定型性，传统当中并不存在与之对抗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分化的过程，即出现了独立于政治、管理、经济、法律甚至宗教权威的人群。因为文字是固定的，不能有丝毫的变更，而人的世界不停地发生变化，一成不变的文本与不断变更的现实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距离，这种差距只能靠解释来加以弥补。如此一来，解释变成了保持文化一致性和文化身份的核心原则。只有对那些支撑身份认同的文献不断地进行解释，相关的人群才有可能获得他们所蕴含的规范性和定型性的效力。他们分享并代表这些经典所具有的权威性和这些经典所展示的真理。在之前的书写文化里，承载和维系“传统之流”的人群同时也是管理人才、医生、解梦人和占卜者，不论如何，他们是从属于政治机构的受命令者。毋庸置疑，这些相对独立的人群的任务就是保证“文字真真切切”。保证“文字真真切切”有可能是进行解释或者保护原有的意义。

无论是西方早期还是中国古代，图书馆除了是文献的聚集之地，也是校书和著述之所，由专职的图书馆员履行文化记忆的承载者职能。古希腊亚历山大图书馆就诞生了诸多博学而著名的馆长和馆员。中国古代皇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由史官充任，这是因为古代皇家图书馆不仅是藏书之所，同时还是校书之所和著述之所，而校书和著述工作需要由文化人群体——史官——来担任。以史官充任皇家图书馆馆职，是由皇家图书馆的“处贤才”职能和藏书、校书、著述职能共同决定的。不过，史官在朝廷中的职务以记事记言和参议政事的谏官为正职，馆职则是兼职。东汉之前，皇家图书馆的馆职并不占独立职官编制，自东汉桓帝延熹二年（159 年）设置秘书监后，皇家图书馆人员配置才被纳入独立职官编制系列，这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员”被列入独立编制的肇始。

（陈越摘编）

◆ ◆ ◆ 河东名人 ◆ ◆ ◆

◆ 河东名人系列九

91. 吴雯

吴雯（1644~1704），清代诗人，与傅山有“北傅南吴”或“二征君”之说。字天章，号莲洋，山西蒲州人，原籍奉天辽阳。其诗清挺生新，自露天真。吴雯博览经史子集，旁及释老诸书，均得妙理。《四库全书》称：“雯天才雄骏，其诗有其乡人元好问之遗风。惟熟于梵典，好拉杂堆砌释氏故实，是其所短”。著有《莲洋集》。

92. 李毓秀

李毓秀（1647~1729），字子潜，号采三，清初学者、教育家，《弟子规》的作者，山西绛州人，青年时，在本县教书、育人、治学、报国。他精研《大学》《中庸》，创办敦复斋讲学。来听课的人很多，门外满是脚印。当地官员曾多次向他请教，十分佩服他的才学，被人尊称为李夫子。他的作品《弟子规》浅显易懂，押韵顺口，文风朴实，说理透彻，可谓谆谆教诲，循循善诱，在我国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93.言如泗（客籍）

言如泗，字素园，是江苏昭文人，孔门弟子言偃子游的七十五世孙，正宗的圣贤后裔。乾隆年间，先后在垣曲、闻喜、解州等做过十数年的地方官。在任期间，他注重农田水利，垒堤疏河，为民造福；又对县学（文庙）进行了大的维修。后又调任解州知州，纂《解州全志》，堪称一大功绩。他推崇关羽，主持增修解州关帝庙结义园及常平村关帝祖庙。他还为保护盐池，对北堰亦加高培土，渠防加固。

94.王文在

王文在（1834~1889），字念堂，号杏坞，绛州稷山县坞堆村人。同治七年（1868年）戊辰科探花，历任翰林院编修、云南省乡试副主考、湖北省学政等。为清代山西省仅有的三个探花之一。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痛心疾首，决定弃政从教，培养人才。他先后在河津书院、河东书院、太原晋阳书院及令德堂书院讲学十余年，学员累计中试者六七十人，其中不乏有志之士、治国之才。

95.全卜年

全卜年（？~1845），字子占，山西平陆县人，台湾知府。进士出身，任职台湾各地，历任五县、二厅、一府、一道。他手把手教当地人民耕犁耘耙，其夫人则帮助当地妇女纺线织布，使生产有了很大发展。1843年以台湾知府身份奉旨担任按察使衙门分巡台湾兵备道。

96.杨深秀

杨深秀（1849~1898），本名毓秀，字漪村，号香齋子，山西闻喜人，清末维新变法人士。光绪进士。精通中西数学，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后授山东道监察御史。1898年上疏请定国是，弹劾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许应骙阻挠新政事。戊戌政变中，不避艰危，援引古义，请慈禧撤帘归政，遂遇害，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97.李岐山

李岐山（1879~1920），名鸣凤，山西安邑西曲马村人。幼读私塾，喜兵法。性倜傥，广交游，夙有大志，不拘小节。1911年武昌起义，李岐山赶赴关中，联络同志，力谋响应。1916年袁世凯称帝，李岐山根据续桐溪等的安排，与续范亭、胡德夫等率数百健儿渡河讨袁，破猗氏、荣河诸城，后在虞乡被封玉玺部击败，未能成事。袁世凯死后，李岐山任陆军部咨议。著有《铁窗吟草》以记其事。

98.张士秀

张士秀（1870~1925），字实生，永济市开张镇南营村人。东渡日本与景梅九、章太炎、张溥泉诸人讨论反满救国大计，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运城光复后，张士秀回到运城，遂同革命党人在运城召开大会，组织河东军政分府，用投票公举法，选举张士秀任河东民军总司令，总理地方军政事宜。1925年张士秀从北京参加孙中山先生葬礼返回陕西，路经新乡时，被阎锡山设计派人刺杀。

99.嘉康杰

嘉康杰（1890~1939），字寄尘，山西夏县人。1927年入党。历任中共河东中心县委书记，河东特委组织部部长。曾在晋南35县的32县建起了党组织，多次策划了中条山武装暴动。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出色地完成了为八路军扩兵任务，受到表彰，中共北方书记刘少奇称赞他是河东“群众领袖”。

100.姚以价

姚以价（1881~1947），山西河津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1902年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在山西督练公所任教，因治军有方，在新军中享有极高声誉。武昌起义，山西革命党人策划响应，推举姚以价为义军司令。同年10月29日凌晨，姚以价下达了攻占太原的作战命令，起义部队即兵分三路向省城进发。拂晓时分，义军从新南门破关而入，将巡抚陆钟琦乱枪击毙，太原起义宣告成功，姚以价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摘自运城新闻网）

☀ ☀ ☀ 好书推荐 ☀ ☀ ☀

◆ 《海贝与贝币》

作者简介：

杨斌，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对中国史、全球史、科技医疗史及海洋史颇有兴趣。

内容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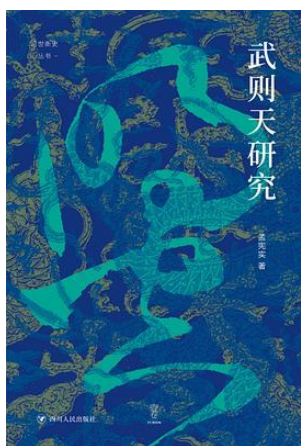
《海贝与贝币》描绘了在两千年时间里，以贝币为媒介的市场是如何将语言复杂、文化多元的印度洋世界整合为一体的，而全球资本主义又是如何终结这个世界的。全书按区域展开分析，同时又超越区域的界限，结合了中国史和世界史两种叙事体系。海贝文化体现出了一种“全球在地性”，即它既是地方性的，也是全球性的；而将陆地世界和海洋世界联系起来的贝币世界，则为全球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 《武则天研究》

作者简介：

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为隋唐历史、敦煌吐鲁番学。出版专著有《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齐鲁书社，2004）、《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中华书局，2017）。2005年始，与荣新江、李肖等先生一起整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书，2008年出版《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在《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学术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90余篇。2006年起，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和《唐高宗的真相》等，曾与阿城一起担任大型电视连续剧《贞观之治》的编剧。



内容简介：

本书不是武则天的传记，每一章的讨论皆是针对一个具体的问题。从武则天出生地与故乡的考证，到武则天归葬乾陵，一代女皇的出生到落幕，中间有着哪些精彩纷呈的故事？女皇的故事，为什么武则天成为了绝唱？在本书中，作者用最详实的史料，与古今学者展开对话，抽丝剥茧，力图向读者还原最真实的武则天。

◆ 《追风筝的人》

作者简介：

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1965年生于阿富汗喀布尔市，后随父亲迁往美国。胡赛尼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医学系，现居加州。“立志拂去蒙在阿富汗普通民众面孔的尘灰，将背后灵魂的悸动展示给世人。”著有小说《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群山回唱》。作品全球销量超过4000万册。2006年，因其作品巨大的国际影响力，胡赛尼获得联合国人道主义奖，并受邀担任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

内容简介：

12岁的阿富汗富家少爷阿米尔与仆人哈桑情同手足。然而，在一场风筝比赛后，发生了一件悲惨不堪的事，阿米尔为自己的懦弱感到自责和痛苦，逼走了哈桑，不久，自己也跟随父亲逃往美国。成年后的阿米尔始终无法原谅自己当年对哈桑的背叛。为了赎罪，阿米尔再度踏上睽违二十多年的故乡，希望能为不幸的好友尽最后一点心力，却发现一个惊天谎言，儿时的噩梦再度重演，阿米尔该如何抉择？故事如此残忍而又美丽，作者以温暖细腻的笔法勾勒人性的本质与救赎，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范晓丽推荐）

本期责任编辑：范晓丽